



词林采英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志和词

飞桃花流水

斜风细雨不须

渔歌子

肥

塞山前白鹭

箬笠

绿蓑衣

黄拔荆一川旻二玫瑰洗

## 前 言

词,又称曲子词,是配合乐曲而创作的歌辞。所以严格地说,它是一种合乐文学。清宋翔凤《乐府余论》说:“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刘熙载《艺概·词概》也说:“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这些不但准确地概括了词的特点,而且清楚地说明了词和曲的关系。

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隋代。据前人考证,保存在唐代崔令钦《教坊记》中的300多个曲名和《敦煌曲子词》中的69个调名,至少有7个可以确认为是隋代的歌曲。即《泛龙舟》、《穆护砂》、《安公子》、《斗百草》、《水调》、《杨柳枝》、《河传》。所以宋人王灼《碧鸡漫志》指出:“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张炎《词源》亦有“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之说。入唐之后,词之制作渐多,尤其是民间更为流行。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谓“胡夷之曲”是指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音乐;“里巷之曲”则指中原一带民间流行的新

曲和流传较久而又经过“翻新”的旧曲（指清乐系统的南方吴声西曲和北方民歌）。这两部分音乐（主要成分是“里巷之曲”）相结合，便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抒情音乐——燕乐。燕乐的发展，带来了词创作的繁荣。于是，为了配合这种新乐而进行的曲词创作，不但在民间进一步流行，而且因为这种曲调新颖美听，也被文人所赏识，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文人按曲填词，使词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唐代诗人中，李白就是较早运用这种新乐曲填词的名家之一。他的名篇《菩萨蛮》和《忆秦娥》被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同列为“百代词曲之祖”。

中唐以后，张志和、刘禹锡、白居易、王建等相继有作，誉满诗坛。到了晚唐，作者更多，影响渐大，这种来自民间的曲子词开始正式登上文坛。其中以温庭筠填词最多，贡献最大。温庭筠词的题材虽然偏于闺情，多写妇女的服饰体态和容貌，带有浓重的脂粉气，格调香而软，但是他在创造词的意境时，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物象和生活细节构成艺术境界，表现人物的情思，以短小篇幅的词调容纳丰富的内容，所以耐人寻味。至于语言的精炼，内容的含蓄，笔调的优美与细密，声律的和谐，更加强了词的文采与声情，他上承南朝齐梁，下开“花间词派”道路，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对词的艺术特征的形成，无疑是

有贡献的。他一生努力写词，共创作词70多首，成为词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这就使词这种诗歌形式从民间转入文人手中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他所开创的“花间词派”不但在文学史上曾经放射出异彩，而且被后来婉约派词人奉为鼻祖，长期而持续地影响着后世词坛。

五代时期，西蜀又出现了一批词人，主要的有：韦庄、牛峤、欧阳炯、顾夔、李珣、和凝等人。他们继温庭筠之后，活跃在当时词坛上，一共创作了400多首词。由于他们的作品风格都与温庭筠相似，所以便形成了以温庭筠为代表的中国词史上第一个词的流派——花间派。在西蜀诸多的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韦庄，他向来与温庭筠齐名，世称“温韦”。他的词从内容上看，与温庭筠并无本质的区别，主要也是写女人、相思离别之类，但他的词风却不像温庭筠那样浓密艳丽，而表现为清疏雅致。他的语言清新自然，感情上也比较真挚。他上承刘禹锡、白居易《忆江南》的风格，下开南唐冯延巳、李煜的先声，严格地说，他与花间派其他作者基调并不协调，所以也可以说韦庄词是花间词的别调。偏安于江南的南唐，是一个富饶的地区，因兵乱较少，社会相对地比较安定，于是这块小绿洲便成了当时文人避乱的理想地点，这样也就形成了词繁荣的另一

个中心。李璟、李煜、冯延巳南唐君臣父子在词的创作上另辟蹊径，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境界，在中国词史上创立了另一个词派——南唐词派。他们之中以冯延巳与李煜成就最高。冯延巳的词虽也不脱女子和相思之类，但比较可贵的是他不像花间词派那样只停留在对女子容貌服饰的描绘，带有浓厚的脂粉气，而是着力抒写人物内心世界，感情委婉深沉，语言清丽流转，形象生动多姿，其美学价值比起花间词人的作品有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他的词从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段，都比温庭筠以来的婉约词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他“开北宋一代风气”是有根据的。他的这种词的风格为后来的晏殊、欧阳修所继承。李煜是南唐亡国之君，他的词虽然仅仅抒发个人的愁恨，但是由于他重视抒写生活的真实感受，表现鲜明的抒情个性，所以能摆脱花间派的窠臼，大大地扩展和提高了词的表现生活、抒发感情的能力，丰富了词的美学内容，显示了词这种文学形式的潜在生命力。因此可以说，词到了李煜手里，不但把意境扩大，而且感情也从绮靡浮艳转为深沉抑郁，即从伶工传唱的花间、樽前的格调变为抒发个人情怀、家国感慨，把文人词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这样，使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夺得独树一帜的地

位。

到了宋朝，词进入了鼎盛的时代。宋以词称，宋词与唐诗、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鼎足而三，各自成为一代文学的主流。两宋之际，词人如林，作品如群芳斗艳，风格各异，流派之众多，内容之充实，艺术之精美，都是无与伦比的。宋词不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对后代词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宋前期，由于结束了五代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社会相对地稳定，经济发展，都市繁荣。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成为词人词作荟萃之地。统治者为了笼络官僚，给以优厚的俸禄，并借游宴欢娱，点缀昇平。一时君臣上下身体力行，许多达官显贵或流连坊曲，或私蓄声伎，在宴会及其他场合，大量填写新词，形成了朝野上下以能词为荣的风尚。

北宋词坛的发展与变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仍受花间派温、韦与南唐李璟、李煜、冯延巳君臣父子词风的影响。清新、艳丽、委婉、缠绵，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而豪迈、奔放、雄壮，则是这一时期词所缺少的。其间虽有苍凉沉远的篇章，如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渔家傲》等，但为数极少，无法改变当时整个词坛的风气。这时期

的代表作家为晏殊和欧阳修。晏殊是北宋初期影响最大的词人之一，他历官宰相，一生富贵显达，《珠玉词》现存 130 多首词，多是应歌之作，内容多写男女爱情，歌舞宴饮，其间还杂有离情别恨、伤春感秋淡淡哀愁。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些小令，虽写富贵却不鄙俗，写艳情而不轻佻，感伤之中又同时透露出一种闲雅的情调和旷达的情怀。有些作品还含有某种哲理。在美感的境界上有新的拓展。欧阳修也是北宋早期重要词人。在词史上他与晏殊齐名，并称“晏欧”。他的大部分词均以爱情为题材，同他在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庄重严肃的儒家学者的面目完全不相同，赤裸裸地流露出词人的真实感情，从中可以窥见其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欧阳修描写恋情相思、惜春离别的作品，受冯延巳的影响较深，但他能取其写情深婉的一面，而摒弃“花间派”铺金缀玉香艳的习气，也没有那种浓腻的脂粉气，一般都表现为清新明媚，语显情深，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疏俊开子瞻（苏轼），深婉开少游（秦观）”。可见他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本时期值得注意的词人还有张先，他因写了不少慢词，所以词史上与柳永并称。但其慢词质量不高，他的主要成就却是那些描情细腻、刻画工致、用语纤巧冶艳的小令。这里还要顺便提

及的还有晏殊的幼子晏幾道，按时间顺序，他本应放到柳永之后，但因他以小令见称于世，而且词风更接近北宋初期，所以仍把他放在这一时期加以介绍。他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子弟，一生坎坷，受尽生活的冷遇，因此他的词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他追步温、韦，词风与其父晏殊有相同的地方，但严格地说，更接近冯延巳和李煜，他的词风虽然偏于守旧，但艺术上却有自己的特色，如写情真切，写景富有变化，语言自然精粹，善于融化前人诗句而不留痕迹等等。前人对此评价甚高，认为小晏词的艺术成就不在晏殊和欧阳修之下。

北宋中期，可以说是宋词最活跃、最有生气、最富有创造性、成就最大的时期。不管是从内容到形式还是风格的多样化方面，比起初期都有明显的进步与变化。因此可以说这时期是宋词的革新与解放时期。其代表人物为柳永和苏轼，尤以专业词人柳永的影响最大，几乎笼罩整个词坛，连苏门弟子秦七(秦观)、黄九(黄庭坚)也不能不受其影响。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词的内容方面作出新的开拓，除恋情相思之外，还着意于描写羁旅行役和都市生活，抒写对官场的厌恶和吊古伤今情怀。为了要表现广阔的社会人生，容纳更丰富复杂的内容，柳永还创作了大量的慢词，通过创



造性地运用铺叙手法，使写景、抒情、叙事得到完美的结合，并注意构思严密、层次分明和首尾连贯。这样就使得原来产生于唐五代的慢词经过他的手里之后，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提高，从而促进当时文人对慢词的重视，为慢词的发展开辟了新路。由于柳永在科场上屡受挫折，他一生穷愁潦倒，长期生活在市民之中，对下层的市民生活有较多的体验，所以能吸收俚俗的语言为教坊乐工歌伎填写新词。这样就使得原来产生于民间经过唐五代宋初文人雅化之后的词，又回到通俗化的轨道上来，让词在市民中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从而获得“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美誉，并对后代的俗文学尤其是说唱文学和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对词的革新和解放，是他的大胆尝试。词在五代和北宋初年，题材很狭窄，大抵不脱伤离惜别、男女恋情之类，其间范仲淹、欧阳修、柳永等人作了一些开拓，稍有进展，苏轼以他的一部分词作显示了他的风格大大地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他的词不仅抒写了他的爱国豪情与远大抱负，而且其中咏史、咏物、游仙、登临、怀古、惜别、悼亡、宴赏，乃至河山风貌、田园风光、参禅

悟道、哲理探讨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这样就 把词从樽前、花间的领域里解放出来，使之 走向广阔的社会，为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同时，他还在形式、语言、音律等各方面进行新的 尝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词风格豪迈奔放，高旷雄健，意境阔大，笔致流宕而自然。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柳永）为舆台矣！”苏轼不但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格调，开拓了词的境界，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创立了豪放风格的词派，为后来南宋爱国词人起了先导作用，并成为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总之，这一时期词的特点是慢词大量增多，词的题材不断扩大，内容更加丰富，词的意境得到新的开拓，词的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出现了许多豪放、婉曲的作品。北宋初年词多用旧调，这时期词人多采用新调，或自度新腔以适应歌唱的需要。以上诸方面都与当时都市繁荣、手工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教坊普遍增加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词人中，比较重要的还有秦观与贺铸。他们两人的地位和影响虽然不及柳永和苏轼，但他们都各有自己突出的成就和特色，为

柳、苏两人所无法取代。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在政治上因受苏轼的牵连而多次被贬，终生失意，但词的创作却与苏轼迥然不同。他远师南唐李煜，近承晏、欧，兼学柳永，他的全部词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即“情”与“愁”。也就是说以抒写儿女柔情与羁旅行役愁苦见长。虽然境界格局不如柳永大，格调气魄不如东坡高，但词中创造出了许多优美的艺术形象，传达出真挚的感情，却比许多婉约派词人高出一筹。词的技巧经过他的手里，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与发展。贺铸的小词情思缠绵，组织工丽，风格与晏幾道、秦少游相近，而秣丽冶艳则过之。张耒的《东山词集序》谓其“乐府绝妙一世，盛丽如游金（金日磾）、张（张汤）之堂，妖冶如揽嫫（毛嫫）、施（西施）之祛”。其长调则能于缜密锤炼之中透出沉郁顿挫之势。境界之高旷，音调之凝响，笔力之激越苍劲，不独张先所无，即柳永、秦观亦未能到。他们两人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生活道路坎坷，一生饱经忧患与痛苦，所以对黑暗现实有一定认识。加之他们才华出众，艺术造诣都很高，因此能写出许多优美动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使北宋词坛更加增光生色，多采多姿。

北宋末期是词艺术上深化成熟的时期，也叫

做集大成时期。其代表人物是周邦彦。他生于湖山秀丽的杭州，既富于文学天才，又知识渊博，且精通音律，能自度新曲。他曾任大晟府提举官，在整理古音、古调和创作新曲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的《清真集》中，绝大部分是写景咏物、描写男女爱情、抒发羁旅行役离愁的作品。他的突出成就是在提高词的艺术技巧与音律的规范化方面，尤其是慢词的创作注意整体的布局，使之结构上曲折回环和前后呼应，把多层次的内容融成一片。他的小令既明净婉媚，又清丽动人。从总的来看，他的词的特点是讲求声律的谐美，着意遣词造句的精巧，用心刻画物态的生动微妙，以清丽婉曲的辞意写他失意的情怀，悉心追求句美、字圆、音谐，把婉约派的风格加以格律化、定型化，从而开了南宋格律派的先声。

继周邦彦之后，在北宋与南宋相交替之际，词坛上又升起一颗新星，就是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以金人攻占汴京为分界线，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前期词清新自然，通过闺阁生活的描写，揭示女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出对幸福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和对大自然的憧憬与热爱，但也流露出时代的感伤，境界比较狭窄。南渡之后，她的生活视野有所扩大，词的内容多思乡怀旧与个人身

世的今昔之感，对国家的前途与民族命运的关怀也时有流露。她的词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惯于以寻常语度入音律，化俗为雅，锤炼无痕，在语言的驾驭上，工力极深，好语如珠，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被誉为“易安体”。她的词虽以婉约为主，但并不缺乏豪放之作。

南渡初年，中原沦入金人之手，古代文化重心东西两京均成为异域，南宋当权者偏安于东南一隅，爱国志士力图恢复，壮志不酬，悲歌慷慨，抒写不平的爱国主义词篇成为当时广大词人的普遍要求。因此苏轼所倡导的豪放词风，很自然地成为南宋众多的爱国词人所接受，并且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把描写激情的豪放词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所以这时期的词的特点是奔放激越，悲凉沉郁，最先拿起词笔参加抗金斗争的词人有赵鼎、李纲、胡铨、张元幹、岳飞等。稍后继起的辛弃疾，则成为杰出代表和词坛领袖。

辛弃疾是我国诗歌史上最负盛名的伟大词人。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未有。”他出生在沦陷于金人之手的山东济南，少年时期就怀有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早年参加耿京农民起义军，后到南方。他一直主张北伐，

统一中国。由于遭到主持朝政的南宋投降派的阻挠和排挤，他的正确主张始终得不到实现。他利用词这一武器进行战斗，抒写他那积郁在胸中的真情实感，表达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反映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民族的坚定决心，批判南宋王朝偏安江左、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抒发失路英雄报国无门、虚度岁月的悲愤。他继承并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风，进一步发展、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突破了诗、词、文的界限，经、史、子、集都可任意驱遣，调弄自如。他善于运用暗喻的手法，使词旨委婉含蓄，不但具有沉郁顿挫的韵致，而且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浪漫主义色彩，成为豪放派的集大成者。

与辛弃疾同时驰突词林的，还有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人，他们的成就、风格虽各不同，但能以凌云健笔写其壮怀悲慨，却是一致的。由苏轼开创的壮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此乃臻极盛，如百川入海，汇为波澜，终于发展为与婉约派分庭抗礼的一大流派。长波九曲，流衍不断，至今不废。

南宋中期，宋金南北对峙局面形成，金国因内乱和蒙古族兴起造成严重威胁，所以无力南下。南宋偏安已久，主和派势力占上风，不思恢复，社会相对安

定，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时婉约词派又占主导地位，并有长足的发展。以姜夔为代表的格律派一时统治词坛，它与北宋时以扩大词的题材，开拓词的视野，提高词的境界，横向发展的特点不同，而是以精密化为特点，不断朝着纵深方向发展，而且支派繁衍，极尽其变。姜夔上承周邦彦格律精严的艺术传统，并有新的开拓。他有意取江西诗派瘦硬的笔法，以矫正周词的圆俗与软媚，并吸收晚唐诗歌的绵邈风神，用来克服辛派末流的粗糙和叫嚣之弊，从而开创了清空冷隽与高雅凝重的词风。他的词用字深微精细，造句醇美高雅，且时有新意。姜词艺术造诣很高，对后世影响极大。张炎专主“清空”，是其嫡派传人，其他如史达祖、卢祖皋、高观国，以及张辑、周密、陈允平等也都颇受其影响。清代浙派词人尤为极力鼓吹，甚至出现“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张炎）”的局面。

南宋词坛上，继姜夔之后，与其并称的另一位著名词人是吴文英。他的词运意深远，构思绵密，用笔幽邃，在超逸之中时有沉郁之思，表现一种迥异于其他词人的独特风格。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他的词被人曲解，以致不为世人所重视，甚至对他的词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很不公平的。吴文英的词，艺术上继承和发展了秦观、周邦彦等人的秾丽深挚，而且直

遍唐人，他的许多词作中画面的罗列和叠印，镜头的跳跃与转换，颇得温庭筠“深美闳约”的神理。他的词能突破时空界限，随意驱遣世间万物，驰骋丰富想象，构思巧妙，意境沉博密丽，某些词还具有西方现代派的结构特点。他对于传统的手法虽时有采用，但主要在于创新，故不给人有因袭之感，处处呈现出与前人迥然异趣的鲜明艺术特色。

南宋灭亡的前后，词坛上又涌现一大批词人，这些词人多数都身历两个朝代交替之秋，他们目睹民族压迫的惨状，饱尝兵灾离乱的痛苦，他们对严峻现实的态度虽各自不同，但是对词的创作却有自己的特色与成就，为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部分词人，面对南宋必然覆灭的可悲现实，继续发扬辛弃疾、陆游等爱国主义词人的优良传统，为拯救民族的危难而呐喊，为祖国的沦亡而慷慨悲歌，其中代表人物有刘克庄、邓瑛、文天祥、蒋捷、汪元量等。他们当中有的还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灭亡，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爱国主义的篇章。另一部分词人则继承姜夔、吴文英所开辟的格律派道路，在艺术上继续探求和发展，著名的有周密、王沂孙、张炎等，虽然他们词的情调比较低沉，音响也不如前一部分词人的作品那样高亢，但同样也是那个不幸时代的哀歌。由于这两种流派的汇合，使得



宋末词坛显得更有时代特色，更加丰富多彩。

词发展到两宋已盛极一时，并达到了高峰，其后由于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散曲杂剧和民间俗文学的兴起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能不受到影响，而一度出现低潮和起落曲折的变化。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时代的更迭交替，它依然流传不衰，并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演变甚至有所创新，直至近代，仍不失其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的女真族在12世纪初期自北方兴起，建立金朝，其后入主中原，与南宋对峙。虽靠着“借才异代”不断吸收汉族文化，但其诗词的成就亦颇可观。元好问《中州乐府》所收录的词就有36家114首，其中除完颜铸和完颜文卿等数人以外，基本上都是汉人。因此可以说金代的词是南宋词的一脉北传，是宋词在不同地域和环境中的延伸和继续。如初期的宇文虚中、吴激等，本是宋朝的使臣，至金后被强留不予遣返，有的如蔡松年随父由宋入金，后出仕金朝。他们身处异域，难免有家乡之思，故土之恋，故其所作词情调多悲郁苍凉。中叶之后，由于宋金议和，战端暂息，40多年没有大战，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都得到相应的繁荣与发展，金朝在自己本土培养起来的作家也逐渐地成长起来，如党怀英、赵秉文、完颜铸等，他们在词的创作上都有一定成就。其他如邓千